

小寒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精彩看点

小寒隆冬，别有一番境界

唤醒智慧的教育
——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钱穆：读好五类书，做一个高境界的人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序《生命的奋进》

人不能笑得太大声，否则会吵醒隔壁的痛苦

细数鲁迅笔下的九类知识分子

刘邦的“气场”

贪欲与激情

目 录

1 / 卷首语：小寒隆冬，别有一番境界

4 / 唤醒智慧的教育
——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11/ 钱穆：读好五类书，做一个高境界的人

21/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序《生命的奋进》

31/ 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会吵醒隔壁的痛苦

32/ 细数鲁迅笔下的九类知识分子

44/ 刘邦的“气场”

54/ 贪欲与激情

| 卷首语 |

小寒隆冬，别有一番境界



今日小寒。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天渐寒，尚未大冷，但隆冬“三九”也不远了。

在这个最寒冷的日子里，有人内心如火，有人却寂寞孤冷，各人有各人的喜悦与惆怅。

如徐志摩的诗歌：“在无法遇见第二个寂寞的人的寂寞冬天。独自行走独自唱歌独自逛街，独自看着一整个世界狂欢。”

对于这个热闹喧嚣的世界，有人欢喜融入其中，却也有人在旁冷眼静观，他们的眼神犀利透彻，总能给人以当头一击。

正如鲁迅先生，虽身处于知识分子漩涡，却也看透了知识分子。他把他们分为了九类，有君子雅人，也有帮闲扯淡的，有革命总管，也有革命小贩……真可谓是书生百态，皆囊其中，令人深省。

我们需要直击人心的棒喝，也需要一盏指引我们迈步前进的明灯。

当前途无明，黑暗中的人们看着前路，只能以自我为中心摸索前行。正如余

世存所说：“自视时的自以为是，视人时的不以为然。”

而“现代人需要照见自身的‘大宝藏’，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燃灯者，并从他们那里领受生命的光明。”

人立于世，不失初心，方得始终，方得境界。

钱穆先生有言：“假如我们诚心想做一人，‘培养情趣，提高境界’，只此八个字，便可一生受用不尽。只要我们肯读书，能遵循此八个字来读，便可获得一种新情趣，进入一个新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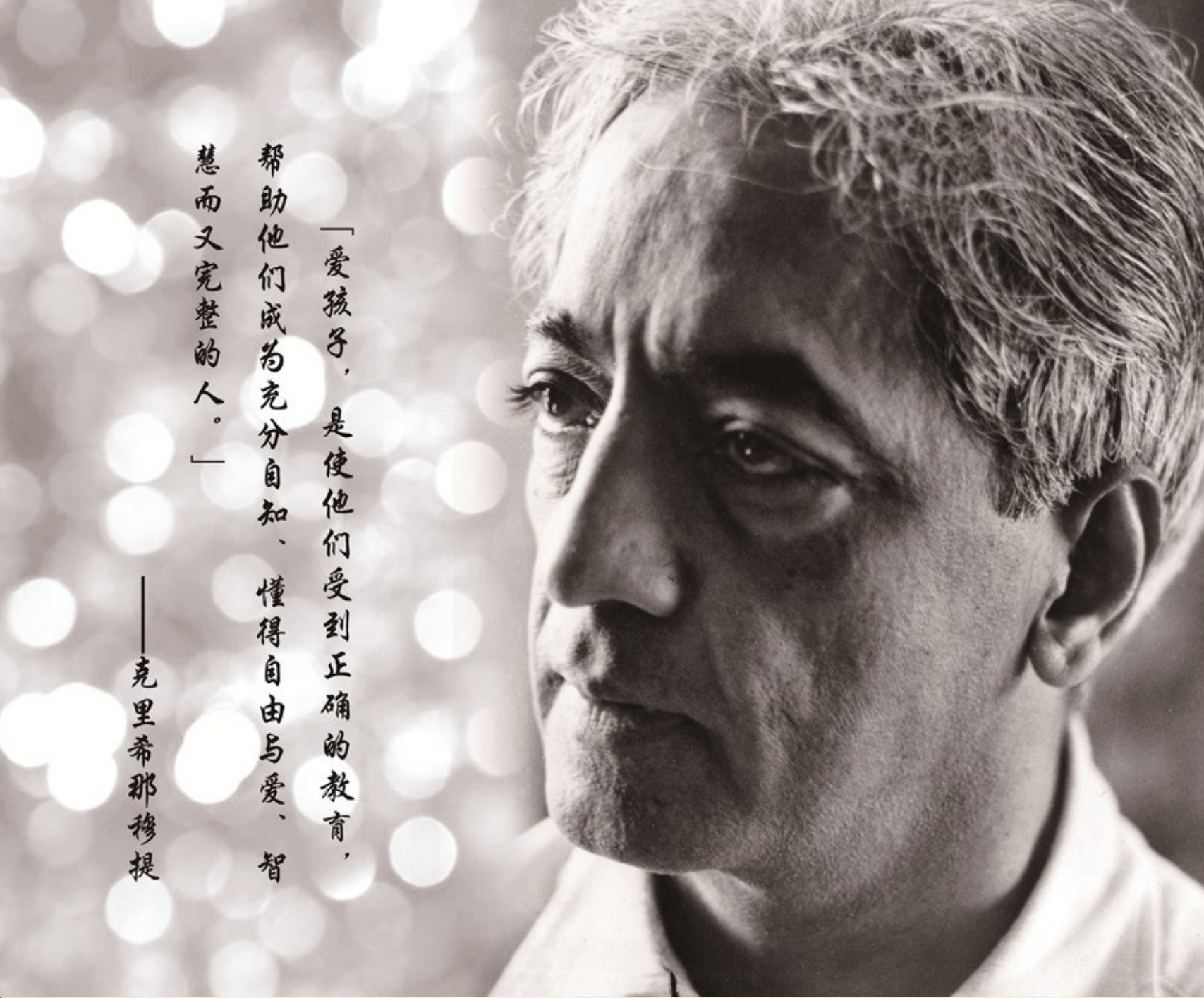
书读得多了，总能悟出一些道理出来，心性也会更加坚定成熟。待人看事也自有这些智慧来引导我们，而不再是茫然无措，摸不着方向。届时，那又是一番境界了！

新年小寒之日，是为之记。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6年1月6日



「爱孩子，是使他们受到正确的教育，
帮助他们成为充分自知、懂得自由与爱、智
慧而又完整的人。」

——克里希那穆提

唤醒智慧的教育 ——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2015年10月24日，英国布洛克伍德
公园学校校长 Adrian Sydenham 先
生做客北京言几又书店，与到场观众
分享了智慧的教育——克里希那穆提
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以下是现场图片：







Yan Ji You

MAKE LIFE
DIFFERENT

传达·生活·可能



相关图书：《克里希那穆提全集》



简介：

克里希那穆提，享誉世界的心灵导师，美国《时代周刊》称之为“20 世纪最伟大的五大圣者之一”。他生于印度，少年时期开始专门的灵性修炼，以后成为彻悟的智者。他一生致力于引导人们认识自我，用自性的光明照亮自己，解放自己。他一生的教诲皆在帮助人类从恐惧和无明中解脱，体悟慈悲与至乐的境界。

此次引进的《克里希那穆提全集》收录了 1933 年至 1967 年间克氏在世界各地的重要演说和现场答问等内容，按时间顺序结集 17 册，并根据相关内容为每一册拟定了书名。1933 年至 1967 年这三十五年间，是克里希那穆提思想发展成熟丰富的重要阶段，因此，可以说这套全集是克氏最具代表性的系列著作，对于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讀·享·團”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钱穆：读好五类书，做一个高境界的人

◎ 钱 穆

为什么读书便能学得做一个高境界的人呢？
因为在书中可碰到很多人，这些人的人生境界
高、情味深，好做你的榜样……



为什么读书便能学得做一个高境界的人呢？因为在书中可碰到很多人，这些人的境界高、情味深，好做你的榜样。目前在香港固然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然而我们大家的做人境界却不一定能高，人生情味也不一定深。

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在书中遇见的人可不同；他们是由千百万人中选出，又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而保留以至于今日。像孔子，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年，试问中国能有几个孔子呢？又如耶稣，也快达二千年。他如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人。为什么我们敬仰崇拜他们呢？便是由于他们的做人。

当知论做人，应别有其重要之所在。假如我们诚心想做一人，“培养情趣，提高境界”，只此八个字，便可一生受用不尽。只要我们肯读书，能遵循此八个字来读，便可获得一种新情趣，进入一个新境界。各位如能

在各自业余每天不断读书，持之以恒，那么长则十年二十年，短或三年五年，便能培养出人生情趣，提高了人生境界。那即是人生之最大幸福与最高享受了。

说到此，我们当再进一层来谈一谈读书的选择。究竟当读哪些书好？我认为：业余读书，大致当分下列数类：

1 . 一是修养类的书

所谓修养，犹如我们栽种一盆花，需要时常修剪枝叶，又得施肥浇水；如果偶有三五天不当心照顾，便决不会开出好花来，甚至根本不开花，或竟至枯死了。栽花尚然，何况做人！当然更须加倍修养。

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几部书是人人必读的。首先是《论语》。切不可以为我从前读过了，现在毋须再读。正如天天吃饭一样，不能说今天吃了，明天便不吃；好书也该时时读。再次是《孟子》。孔、孟这两部书，最简单，但也最宝贵。如能把此两书经常放在身边，一天读一二条，不过化上三五分钟，但可得益无穷。

此时的读书，是各人自愿的，不必硬求记得，也不为应考试，亦不是为着要做学问专家或是写博士论文；这是极轻松自由的，只如孔子所言“默而识之”便得。只这样一天天读下，不要以为没有什么用。如像诸位每天吃下许多食品，不必也不能时时去计算在里面含有多少维他命，多少卡路里，只吃了便有益；读书也是一样。这只是我们一种私生活，同时却是一种高尚享受。

孟子曾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连做皇帝王天下都不算乐事，那么，看电影、中马票，又算得什么？但究竟孟子所说的那三件乐事是什么？我们不妨翻读一下《孟子》，把他的话仔细想一想，那实在是有意義的。人生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有人以为月入二百元能加至二百五十元就会有快乐，哪知等到你如愿以偿，你始觉得仍然不快乐。即使王天下，也一样会不快乐。

我们试读历史，便知很多帝王比普通人活得更不快乐。做人确会有不快乐，但我们不能就此便罢，我们仍想寻求快乐。人生的真快乐，我劝诸位能从书本中去找；只化三两块钱到书店中去，便可买到《论语》、《孟子》；即使一天读一条，久之也有无上享受。



还有一部《老子》，全书只五千字。一部《庄子》，篇幅较巨，文字较深，读来比较难；但我说的是业余读书，

尽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即是一大学者，他读书也会有不懂的，何况我们是业余读书；等于放眼看窗外风景，或坐在巴士渡轮中欣赏四周景物，随你高兴看什么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尽了，而且是谁也看不尽。

还有一部佛教禅宗的《六祖坛经》，是用语体文写的，内中故事极生动，道理极深邃，化几小时就可一口气读完，但也可时常精读。其次，还有朱子的《近思录》与阳明先生的《传习录》。这两部书，篇幅均不多，而且均可一条条分开读，爱读几条便几条。

我常劝国人能常读上述七部书。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今天在座年幼的同学们，只盼你们记住这几部书名，亦可准备将来长大了读。如果大家都能每天抽出些时间来，有恒地去读这七部书，准可叫我们脱胎换骨，走上新人生的大道去。

2 . 其次便是欣赏类的书

风景可以欣赏，电影也可以欣赏，甚至品茶喝咖啡，都可有一种欣赏。我们对人生本身也需要欣赏，而且需要能从高处去欣赏。最有效的莫如读文学作品，尤要在读诗。这并非要求大家都做一个文学家，只要能欣赏。谚语有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诗中境界，包罗万象，不论是自然部分，不论是人生部分，中国诗里可谓无所不包。

一年四季，天时节令，一切气候景物，乃至飞潜动植，一枝柳，一瓣花，甚至一条村狗或一只令人讨厌的

老鼠，都进入诗境，经过诗人笔下晕染，都显出一番甚深情意，趣味无穷；进入人生，所遇喜怒哀乐，全在诗家作品中。当我们读诗时，便可培养我们欣赏自然，欣赏人生，把诗中境界成为我们心灵欣赏的境界。如能将我们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诗中，那真趣味无穷。

如陶渊明诗：

犬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

这十个字，岂非我们在穷乡僻壤随时随地可遇到！但我们却忽略了其中情趣。经陶诗一描写，却把一幅富有风味的乡村闲逸景象活在我们眼前了。我们能读陶诗，尽在农村中过活，却可把我们带进人生最高境界中去，使你如在诗境中过活；那不好吗？

又如王维诗：

雨中山果落，
灯下草虫鸣。

诸位此刻住山中，或许也会接触到这种光景：下雨了，宅旁果树上，一个个熟透了的果子掉下来，可以听到“扑”“扑”的声音；草堆里小青虫经着雨潜进窗户来了，在灯下唧唧地鸣叫着。这是一个萧瑟幽静的山中雨夜，但这诗中有人。上面所引陶诗，背后也有人。只是一在山中，一在村中；一在白天，一在晚上。诸位多读诗，不论在任何境遇中，都可唤起一种文学境界，使你像生活在诗中；这不好吗？

纵使我们也无法亲历其境的，但也可以移情神游，于诗中得到一番另外境界，如唐诗：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那不是一幅活的人生画像吗？那不是画的人，却是画的人生。那一幅人生画像，活映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去欣赏。在我想，欣赏一首诗，应比欣赏一张电影片有味，因其更可使我们长日神游，无尽玩味。不仅诗如此，即中国散文亦然。诸位纵使只读一本《唐诗三百首》、只读一本《古文观止》也好；当知我们学文学，并不为自己要做文学家。因此，不懂诗韵平仄，仍可读诗。读散文更自由。学文学乃为自己人生享受之用，在享受中仍有提高自己人生之收获，那真是人生一秘诀。

3 . 第三是博闻类

这类书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求自己爱读，史传也好，游记也好，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性之所近，自会乐读不倦，增加学识，广博见闻；年代一久，自不寻常。

4 . 第四是新知类

我们生在这时代，应该随时在这时代中求新知。这类知识，可从现代出版的期刊杂志上，乃至报章上找到。这一类更不必详说了。

5 . 第五是消遣类

其实广义说来，上面所提，均可作为消遣；因为这根本就是业余读书，也可说即是业余消遣。但就狭义说之，如小说、剧本、传奇等，这些书便属这一类。如诸位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可作是消遣。

上面已大致分类说了业余所当读的书。但诸位或说生活忙迫，能在什么时候读呢？其实人生忙，也是应该的；只在能利用空闲，如欧阳修的“三上”，即：枕上、厕上和马上。上床了，可有十分一刻钟睡不着；上洗手间，也可顺便带本书看看；今人不骑骡马，但在舟车上读书，实比在马上更舒适。古人又说“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者晴之余。

现在我们生活和古人不同，但每人必有很多零碎时间，如：清晨早餐前，傍晚天黑前，又如临睡前；一天便有三段零碎时间了。恰如一块布，裁一套衣服以后，余下的零头，大可派作别的用场。另外，还有周末

礼拜天，乃至节日和假期，尤其是做教师的还有寒暑假。这些都可充分利用，作为业余读书时间的。假如每日能节约一小时，十年便可有三千六百个小时。

又如一个人自三十岁就业算起，到七十岁，便可节余一万四千四百个小时，这不是一笔了不得的大数目吗？现在并不是叫你去吃苦做学问，只是以读书为娱乐和消遣，亦像打麻雀、看电影，哪会说没有时间的！如果我们读书也如打麻雀、看电影般有兴趣、有习惯，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都可读书；这样，便有高的享受，有好的娱乐，岂非人生一大佳事！读书只要有恒心，自能培养出兴趣，自能养成为习惯，从此可以提高人生境界。这是任何数量的金钱所买不到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香港调景岭慕德中学讲演，新亚书院《生活双周刊》五卷十五期。）

本文选摘自《历史与文化论丛》（新校本）

钱穆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加进行了分析和叙述。旨在让读者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期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阐扬和光大我们本身固有的文化精神，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正如钱穆先生自己所说，本书着眼“在此下求变求新之基础根源上有所指陈，使读者易有启悟，易有奋发，固非如已陈之刍狗，或如楚人献璞，苟善为破解，其中容有美玉之存藏也”。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

——序《生命的奋进》

◎ 余世存

近现代中国在中国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是非常道，用新儒家的观念，这是一段“坎陷”的历史 ……



近

现代中国在中国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是非常道，用新儒家的观念，这是一段“坎陷”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观念、物质成就、人物风范，在现代化极为张扬的参照里，一时黯淡无光，甚至被视为落后、反动保守、糟粕、遗老遗少一类，理想主义、唯物主义、全盘西化、斗争哲学、科学主义、革命精神、拜金拜物教等等盛行。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等等文明单位在寻找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本来面目，发生了很多悲剧、闹剧，这个现代化过程，至今方兴未艾。用新儒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只充当了“材料”，难以超拔成为“形式”。用佛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入至今未能修成“正果”。

我们由此可知，对某一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做出相似的解释。尽管有人以为中国人已经很“成功”，当代中国人幸逢“盛世”，但佛家、儒家、耶家乃至现代性都未必认可。就像有人一再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但从上至下的中国人和家庭仍多以留学海外、移民为生活的目标。

这个东亚大陆上发生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使个人生命乃至家国社会都跌入黑暗的谷底，无数人在其中挣扎、喧哗、制造热闹，但在有识者看来，这个底部生存，无论多么理想、得意，其实都是一种无明状态。没有真正的光明烛照，一切的努力付出最多也就是漫漫长夜里的摸索，更多是收获了负值，增添了罪苦。这种历史，历史上众多的仁者、贤者都感受到了。《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佛坦承无明时代燃灯佛对他的加持，“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圣经》里记载，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他对人在无明中犯下的罪如此感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作的，他们不晓得。”而在中国被称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宋代，一个读书人在一个邮亭里写下了很多人的心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我们由此可知，在历史的非常道上，在人生社会的参照上，最为重要的是人格成就，它才是照亮我们生命的灯火。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上，人们多以国家、组织、政治、科技理性、学问、金钱等等为人生的参照灯塔，甚至以政治人物、成功人士为参照。即使宅心仁厚、怀抱理想的人也以为，如果要推崇人格成就，那也是推崇历史上的圣贤如孔孟等人，现实中的人格完善意义不大。当然，很多人更是视人格如无物，甚至嘲笑它。只有时过境迁，我们才能理解，那些人格的光辉意义。

知识人承认，在当代知识界的沦落中，幸而有一个顾准，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信仰者则说，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气节难现于当代时，是一些伟大的个体为全民的罪苦承担了救赎。当然，传统中国的人格气象仍在，只是在少数人那里，不为大众甚至一般读书人所知罢了。儒释道的精神在百年中国的革命世纪里涅槃、新生，如新道家的陈撄宁、新佛家的太虚大师以及新儒家的熊十力等人，就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果实。一般人以为他们迂腐了，属于现代化的边缘者，稍具同情者也以为他们的人生成就“陈义过高”，跟现实有距离，不比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奉献者或牺牲者。

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儒释道精神的现代转化，无论如何，都立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何处去的“忧患”传统，这一忧患比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忧患更关键更重大，用传统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经学”或道统之忧患，是大本大源之忧，本立而道生，源远流长。正是有这样的误解，一般人才以为道德人格文章不如才子文章，人性人心才会受才学左右，认知才会受时势左右；如此伊于胡底，读书人只读时文，年轻人不接受前辈文章，中学生则是青春文学、偶像作家的粉丝。只有时过境迁，他们才能渐渐告别自己心智的蒙昧无明。

就像今天不少成功人士，告别了他们青春少年喜欢的样板戏、宣传体或“文革”思维，开始接触佛法、《圣经》等人类文明的经典，开始接触那些以血以生命人格

铸就的文章。一句话，一切追求眼前而急功近利的人物文章都将是过眼烟云，如果我们在其中流连忘返，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收获极微。只有那些立足于人生社会终极的经典、人物，才是值得我们去“勤而行之”的。如果我们以为那些经典、人物不够切己，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活在本能的、无明的状态？我们是否是无志、难立的自了汉？用传统或现代的语言，如果我们不参赞那些人物、经典，如果我们对其不以为然而自以为是，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是君子对立的小人，是否是与公民对立的市侩子民？



有人以为，成为君子大人，成为公民，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或使命，大多数人还是要过寻常的日子，只能成为小人、百姓、市民。一如西哲讨论人有自愿做奴隶的自由一样，这其实也是一种无明之见。不仅文明演进在抛弃这种人性的坎陷或自甘堕落，全球化时代，没有

人能够自外于环境，以小人之态自立或孤立，环境推动着社会个体日新又新；就是个体自身，在环境的加持里也有着向上跃进的权利和责任。这种文明史的开花结果也为中外大哲注意到了，人们感叹“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人们憧憬，人类发展的结果，将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由此可见，人类自身卑下的情操固然可以显明一时一地，但人终究有高远也切身的人生目标。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新儒家诸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作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之久，集中于诸子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亲切是不用说了，最让人感动的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以后来成圣成贤的心地回望自己的青春少年，把握到其青少年时代的诸种人生轨迹或线索，对读书生活的回顾，对父亲、母亲等至亲的孺慕，对师友的怀念，对流行思潮的怀疑或消化，都值得我们记取。正是这些线索成就了他们。梁漱溟先生说他对当时社会的感受是，“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熊十力先生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党，但在广东，“居半年，所感万端，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私欲潜伏，多不堪问。”因而下决心献身学术。由此可见他们青少年时的反思。牟宗三先生说，东西方文化各有其精彩，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文化则以生命为

中心，遗憾的是，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断绝了。而新儒家诸子们反求诸己的努力使他们接通了中国的生命学问。



(1946年9月熊十力返汉口经上海时在学生朱慧清家与学生牟宗三等合影留念。由右至左为：丁实存、熊世菩、徐复观、朱霏(男童)、熊十力、高纫秋(后立)、朱宣琪(女孩)、张立民、朱雷民、牟宗三)

东西方文化都认知到，生命种子本来蕴涵一切可能性，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大宝藏，不假外求。西哲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释迦牟尼佛感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慧能大师说，本自具足。问题在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是如何从先天具足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残缺、污染、病变、形格势禁的后天状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救度此身此生。佛子所说，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现代科学也证实，比起一切外药来，人身自有大

药，人身之药更为切实。潘雨廷先生曾感叹，“凡人初出母胎，本来潜备无穷无尽德用，是大宝藏，入此大宝藏而得乾坤衍，不己较龙树入龙窟以得华严为发展乎！合诸西洋文化，哲学基础在自然科学，由天文、地质、物理、化学而生物，由生物而究及生命起源，莫非在窥此大宝藏，自成立分子生物学以至量子生物学后，其义大显。”

因此，现代人需要摆脱自视时的自以为是，视人时的不以为然，这都是一种生命的无明。现代人需要照见自身的“大宝藏”，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燃灯者，并从他们那里领受生命的光明。新儒家诸子们未必实现了其人生社会和文化的目标，但他们是中国文化优秀的传灯者。他们是学问家，是修行者，是实践家，他们在现代化多难的进程里示范了一种伟岸的士的人格。在传统社会里，士被称为四民之首，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士是公民之首，士是一个共同体个体成员所能抵达的人生大成就。《大戴礼记》中借孔子之口定义士，“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我们看新儒家诸子们青少年时代的追求，正是士的体现。而其同时代乃至今天流行的人物，似乎已经真理在握，已经穷尽学问道术。但时过境迁，我们今天明白，现代中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里，新儒家诸子才是为数不多的可礼赞的人物。他们的学问成就如何暂且不论，他们的人生境界是坎陷时代的燃灯，可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心性。

2015年8月19日写于北京

相关图书：《生命的奋进——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著

九州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所辑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的文章，自述其青少年时代怀乡忆亲、读书做人的经验，行文浅易清晰，内容亲切感人。五位大师出身贫寒，目睹近代中国的激荡与变迁，自觉奋发向上，探索学问，一路走来，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留名于中国文化史。回望大师们的人生轨迹，其青少年时代意志之坚强，读书之勤勉，心怀之宽广，求真之热诚，仍可激励和启发当今青年一代。



人不能笑得太大声，否则会吵醒隔壁的痛苦

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

一间住着痛苦

另一间住着快乐

人不能笑得太大声

否则会吵醒隔壁的痛苦

——卡夫卡《箴言录》



细数鲁迅笔下的九类知识分子

◎ 钱理群

鲁迅讲，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



一、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

鲁迅讲，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

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

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地“出山”了，这时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

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之类，包括屈原，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产物。“帮闲”不过是写写诗，猜猜谜语，说说笑话；“帮忙”则是要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大事。



（电视剧《凤求凰》中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下棋，做清客，而愿作“帮忙”，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当主人作恶之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二、“二丑”

“二丑”出自绍兴戏曲，在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清客、幕僚也就是帮闲。但是一方面他帮主人的闲，一方面又向观众做鬼脸，说“你看，这个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与主人划清界限。“二丑”是不忠实

的奴才。

知识分子聪明而敏感，主人气焰正盛之时，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之时，他敏感到了，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结果成为“二丑”。

三、隐士

鲁迅把中国文学尤其是唐朝文学划分为两种：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

廊庙文学是帮忙帮闲的文学或者叫在朝文学。在野的文学就是山林文学，不做帮忙帮闲，离开主子的衙门，隐入山林。

但是中国隐士与西方隐士不同。西方隐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隐，因此西方隐士常常同时又是苦行僧，不断对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中国隐士是政治性的，帮忙、帮闲不成便去做隐士。隐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一有机会，便由隐士自然转为帮忙帮闲，算是“候补的帮忙帮闲”。

在中国做隐士还有一个好处：易出名。出名之后成为高士，名声若传到皇帝耳中，也许有机会得到重用。由此，隐士成为一种资本，做隐士可以提高地位，成为进一步做帮忙帮闲的资本。

鲁迅尖锐指出，登仕、隐士都是“噉饭之道”，是达到自己目的，升官发财的途径。最可怕的是“谋官谋隐两不成”。可见官是要谋的，隐也是要谋的，官和隐没有本质区别。

隐士看似悠闲，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悠然见南山”也需要物质基础，陶渊明有奴才给他做饭、种地。饿着肚子，陶渊明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隐士并非不食烟火，也要追求物质的东西。



鲁迅分析隐士心理：“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不见，耳不闻，他心平如水”，但是“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们一伙的”，则“虽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聪目明，奋袂而起”。这真可谓入木三分。

四、君子和雅人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杀时发抖的样子。这是君子的特点，也是其内在的矛盾。

鲁迅加以夸张的嘲讽，说君子将牛羊赶得远远的，然后“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

皆备于我了”。这样的雅人其实是俗的，他毕竟要吃牛羊肉。作为人，永不能避开俗世。问题在于，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远远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他害怕看残酷的事情，对残酷的事情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借以保全自己的“性灵”。

鲁迅讲了两个笑话。有一个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这看起来很“性灵”，但仍不够，因为还得吃饭，所以还要有一个卖大米的。

又一个人希望秋天时，他吐半口血，由一个侍女扶着，病恹恹地去看海棠。这看起来非常的雅。秋天，病恹恹地看海棠，还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见再有诗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着。

这两个笑话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识分子其实脱离不了俗世。而这种雅，这种君子之志，不过是对血腥、对残酷的回避。他们用病恹恹地看海棠之类的雅事来掩盖吃人杀人的血淋淋的现实。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他们不可能不俗，得吃饭，得活着；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



（林语堂）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如此严厉的批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五、革命小贩

有一个叫杨邨人的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革命队伍。据说是因为“家有老父母”。其实是否干革命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曾经干革命，却出卖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击当年的革命战友，包括鲁迅。鲁迅于是作文“骂”他。

杨邨人回信说自己有苦衷，两头不讨好：当年的革命战友对我不好，当局者对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鲁迅指出就是因为你只是“革命小贩”。你拿革命来做买卖，但在当局者看来，你门面太小，资本不够。当局者看中“永远的阔人”：革命前是阔人，革命后还是阔人。

这样的人永远不吃亏。还有一种人彻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胆子太小，背叛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

六、“革命工头” “奴隶总管”

这是鲁迅与周扬论战时提出的概念：他们是革命者，甚至是领导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头。鲁迅常说，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当奴隶，要我为他们干活，我每回回过头来稍示反抗，还说我对革命不够努力，要我拼命干，但他其实不过是个工头。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还是个奴隶主。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概念：过去的统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资本家，而现在的统治者，却打着革命旗帜，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为工头和奴隶总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七、文坛三户

鲁迅观察20世纪30年代文坛，发现三种类型的作家。

第一种是破落户，当年曾经红过一阵子，但现在“边缘化”了，家境大不如前，于是他就抚今追昔，常常吟诵着“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很有些

“顾影自怜”的味道。

第二种是暴发户。破落户还是有一定资本的，暴发户则是由于偶然原因，突然出名。于是他买很多的书，“房间里有《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头上有石印骈文，但是他读不断”，他一方面吟唱着“襟上杭州旧酒痕”，但又害怕人们看不到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旧长袍，已经是西装笔挺了，于是乎“沾沾自喜”。

最可怕的是刚暴发没多久便即破落的暴发破落户，他们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又没有顾影自怜的风姿。这类人有两个发展前景。向积极方面发展，就成为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是为“才子加流氓”；向消极方面发展，便成为瘪三，到处讨吃，得一顿饭而已。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了的，所以他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八、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国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则近官，涉海则近商。京派是官的帮忙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帮闲。从官那里得食，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绰绰。北京文人频频向官方暗递秋波，但只能“暗递”，还不能公开投靠，公开就要受谴责，所以只能“隐”。当商的帮忙帮闲，其情状则“显”。

北京文人与上海文人有明显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北京文人则稳重、城府很深的样子。糟糕的是，单纯做官的帮忙或单纯做商的帮忙都

不行了，于是南北合流，把断砖、旧袜、皮袍与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杂烩。



（1930年代，上海的社交Party。图为1918年开店的上海王开摄影有限公司所拍摄，于不久前在其南京东路378号公司地下档案室发现）

九、大众的帮忙、帮闲

他打着大众的旗号，做大众的代言人。其实，他的个体意志服从于大众意志，做的是大众的帮忙帮闲。应该说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

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主要是官的帮忙帮闲，到了近代社会，也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但继续做官的帮忙帮闲，而且有做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

针对上述状况，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

务。”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也用权，但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他与大众是平等的，可以作大众的事业，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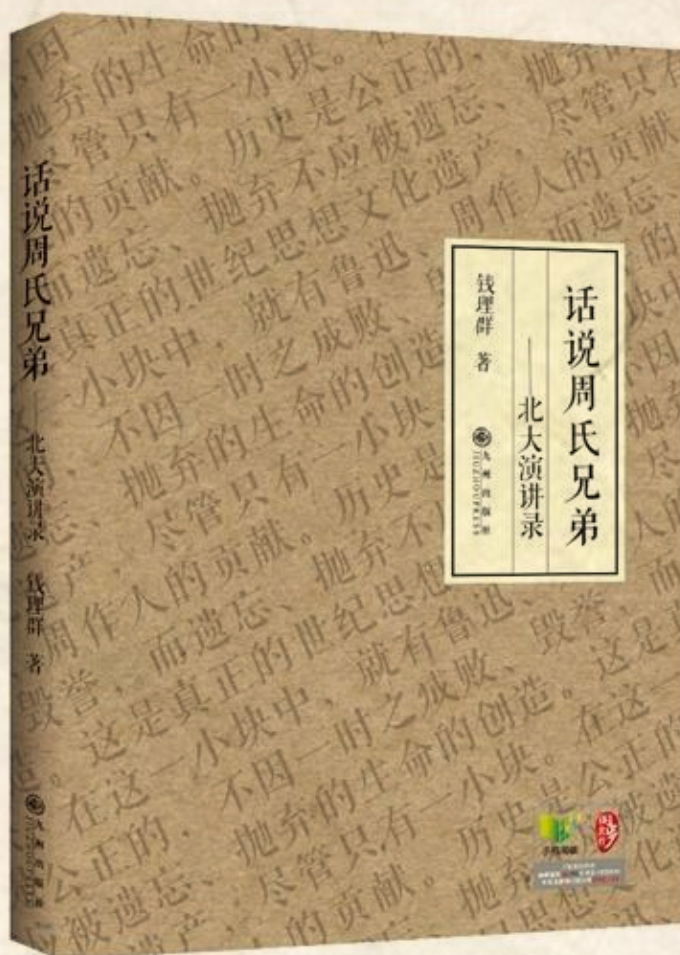
鲁迅又提出了“包围论”。他说，无论什么人，尤其是“猛人”，周围都有一群包围者。人们无法与之直接见面，只能通过包围他的人去了解他。包围者往往起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他歪曲“猛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使“猛人”逐渐变得昏庸，成为包围者的傀儡。这样的包围者常常是由知识分子扮演，也是帮忙帮闲之一种，既可怕又可憎。

鲁迅善于取绰号，用绰号高度概括对手的特点，神情毕肖，如“革命工头”“革命小贩”，这些绰号永远跟随着对手，天涯海角也甩不掉。

本文选摘自《北大演讲录——话说周氏兄弟》

钱理群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根据钱理群教授上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的，涵盖了钱理群有关鲁迅、周作人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等方面的最新思考。这些论题均是先生长期情有独钟、寄寓深厚之所在。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



刘邦的“气场”

◎ 曾纪鑫

你不得不承认刘邦确有一套团结部众、笼络人心的高强本领。这种本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氓生涯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你

不得不承认刘邦确有一套团结部众、笼络人心的高强本领。这种本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氓生涯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如胸襟开阔、容纳百川、大度洒脱、为人义气、不计前嫌等。只要把放刁撒泼耍赖的行径甩掉，众人一抬，自己有意识地将过去的不良习气改正，正面效应就会相当凸显，刘邦的形象也就得到了拔高与升华。



刘邦的起兵，完全出于一次偶然事件。他以亭长身份送县上的民工到骊山去服劳役，因局势混乱，不少人在半路上就寻机逃跑了。刘邦便想，像这么个样子，等到达目的地时，恐怕全都逃光了。既如此，都是自家

乡亲，好些人还跟自己关系挺不错的，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干脆将他们全部放跑算了。

这天晚上，一行人来到丰西的湖沼地带，刘邦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酒，趁着朦胧的夜色，将绑缚民工身子、手脚的绳索一一解开，然后挥挥手说：“你们全都逃命去吧。”有人说我们逃了你怎么交差？刘邦就说：“我也只有像你们一样逃命了。”他们情不自禁地为刘邦的仗义之举所感动，当即就有十多人不愿离去，愿跟从刘邦效命。

这可能是刘邦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多的人俯首帖耳无条件地愿意为他效命，他自然很感激，“众星捧月”也使他感到了一种难得的陶醉，甚至还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然而，时间一长，他的随和、平易就使得他的威严渐渐消失了。如何才能保持那种众人信奉、崇拜的局面并长期将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下呢？于是，他或是他的亲信、部下、朋友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些神秘的气氛四处散播：

刘邦是母亲刘媪在梦中与神交合而生；秦始皇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并因此而厌恨，这种“天子气”便与刘邦有关；就在刘邦放走民工的当天晚上，他独自一人杀死了变作一条拦路青蛇的白帝之子，能够杀死白帝之子的人当然就不是一介凡夫了，而是尊贵无比的赤帝之子；刘邦无业无产无赖，一直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妻子吕雉就是因为他相貌堂堂贵不可言而为岳父吕公所赐；一位神秘的老人曾向吕雉讨水喝，吕雉心怀惻隐地施舍了他一顿饭，于是老人就感恩戴德地

说她是“天下贵人”，并说她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儿子的缘故；刘邦放跑民工后与跟随他的那一帮子人“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雉带着很多人来投奔他，大家都感到奇怪，刘邦等人藏得这么隐秘，吕雉怎么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呢，吕雉便得意地一笑，说她老公头上笼罩着一层五彩云霞，她一望而知，所以就直奔而来了……



这些神奇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前来依附刘邦的人就更多了，慢慢地还真的有了几分“气候”。

这样的声势造得越大，投奔的人就越多。可是，有关神秘、神奇、神异之类的玩意儿只可迷惑一时，时间一长，人们就能窥其“堂奥”，戳穿那层一钱不值的“外衣”。然而，随着刘邦势力的增长，投靠他的人却越来越多，就连项羽手下的不少名将、谋士都纷纷倒戈前来投靠，你不得不承认刘邦确有一套团结部众、笼络人心的高强本领。

这种本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氓生涯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如胸襟开阔、容纳百川、大度洒脱、为人义气、不计前嫌等。只要把放刁撒泼耍赖的行径甩掉，众人一抬，自己有意识地将过去的不良习气改正，正面效应就会相当凸显，刘邦的形象也就得到了拔高与升华。而这种拔高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建立在冷峻、威严、残酷基础之上的至高无上，也不是像项羽那样的刻意表现自己的贵族血统与英雄气概，刘邦的拔高，是建立在亲切随和、平易近人的基础上的升华。

秦始皇的拔高是远离众人，将自己变成一座孤傲而寂寞的山峰，颇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意味；项羽的拔高是有意识地拉开他与部众之间的距离，结果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而刘邦的拔高是众人可以接受并参与其中的亲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这是一种常人无法企及、无法达到的看似平凡的伟大。古人对这种万能胶般的亲和力无法解释，就常常以一个“气”字概而言之——霸者之气、帝王之气，与今人所说的“场”十

分相似——如磁场、气场等。

刘邦的“气”一旦形成并日渐凝聚，投奔者愈多，名气也就越来越大。沛县的父老乡亲举事起义，杀死县令打开城门，将刘邦所聚部众迎进城内，共推他做县令。刘邦说自己才薄德浅，不肯接受，而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吏，皆瞻前顾后，担心事情不成祸连家族，就一个劲地让与刘邦。刘邦坚决推辞，众人不好强求，便立他为沛公。也就是说，刘邦还是沛县的起义首领，只不过换了一个称谓而已。

一时间，部众很快就发展到了二三千人，并向四周出击，打了好几场胜仗，占据了邻县的一些地盘，收编了数千秦军。不久，又得到楚军大将项梁五千军士的帮助，兵力一下子扩张到万余人，并与项羽在雍丘城下配合作战，大破秦军，斩杀秦将李由。



鸿门宴后，项羽并未向刘邦动武，而是西向咸阳，杀了秦王及其家属，焚烧秦宫，抢掠珠宝，挖掘秦墓，

“所过无不残破”。项王由此而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每一次王朝更换，新的继任者都要做出一些否定前朝的过激行为，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一把冲天大火烧掉前朝的宫殿、毁掉前朝的政绩、抹掉前朝的痕迹。殊不知，他们毁灭的这些成果乃是属于人类历史、属于中华民族的文明积淀。人类发展，只有立于前人的基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中华专制帝国几千年来总是徘徊不前，老在一个地方颠来倒去地兜圈子循环不已，与这种典型的项羽式的虚无主义行径不无关系。

刘邦虽是流氓，但他流氓过后，毕竟宽大为怀地处理了前秦遗产。两相比较，项羽的全盘否定则使他在民众心中的印象与地位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秦王朝像一股云烟转瞬间飘散在历史深处，项羽再也不必担心它死灰复燃了。仇已报，气已消，接着面临的的就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政体与政府。既然是全盘否定，项羽就不以秦始皇的中央集权作为帝国的政体模式加以考虑，而是意图恢复大一统以前的七雄并峙状态，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项羽对灭秦的有功之臣大加封赏，他一共封了十八个王位，每人一块地盘，建立一个小国，再由这些小国组成庞大的联合体。而他，就是这个联合体的盟主，他自封为西楚霸王，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就以故乡彭城作为新型政府的中心与首都向全国诸侯发号施令。公元前206年阴历二月，项羽将这一措施正式付诸施行。

项王构想的新型政体颇有一点美国联邦制的意味，当然与其民主化、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周朝正是因其“联邦制”而走上了末路，它显然不适合于中国当时的现实与土壤。秦始皇所建立的高度中央专制集权统治虽然是走了一条极端的路子，但实则有着中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包孕其中。秦始皇将专制、集权的模式一旦奠立确定，要想回到西周的分封时代，已大不可能了。也就是说，项羽的政体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有悖于当时的时代潮流。



在分封中，刘邦虽然也捞了个王者之称，但项羽并没有把他留在关中为王。这次，项羽耍了一点小小的聪明，将他派到关中南面、封闭偏远的汉中之地，封他做了个汉王。

刘邦对项羽的负约自然心存怨言，但是，能够弄个大王当当，也是蛮不错的了。在即位南下时，他命人烧

毁栈道，既防诸侯偷袭，也是一种划地为王心满意足的表现，当然也不乏故意麻痹项王以示他无意东进的谋略在内。

刘邦一到汉中，那些跟随他的士兵全都想起家来，并一个劲地鸣冤叫屈。明明说好了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当关中王的，却把咱们一个个给派遣到这么一个闭塞的鬼地方来了。大伙儿一鼓噪，刘邦的心也就动了。既然当了王，就不能只想着自己一人，也得替大家分忧解愁才是。心一动，就有了谋反项王之意，并开始了积极而又隐秘的准备工作。

本篇内容选摘自《历史的刀锋——11个人的中国史》

曾纪鑫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改变历史的角度,选取古代社会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十一位典型代表人物,将他们还原于当时复杂纷纭的历史舞台,置放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与广阔的历史空间,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用现代人的全新意识,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观照与比较、透视与研究、描述与反思。从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历史偶然中寻出不可逆转的必然规律,把握历史脉搏与发展线索,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发展的斑斓图景。



贪欲与激情

◎ 克里希那穆提

我们知道，“激情”来自希腊语中的“磨难”一词，但是实际应用中，我感觉它并不是一个表达痛苦之义的词语，相反，倒包含着某些催人奋进的意味……



问：什么是激情？您谈过这个概念，很明显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但对此我自认为理解不了。我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性本能，也热衷于把车开得飞快或侍弄漂亮的小花园这类肤浅的事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沉溺于某种富于激情的活动。如果你谈起某人酷爱之事，你一定会看到他兴奋得两眼放光。

我们知道，“激情”来自希腊语中的“磨难”一词，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我感觉它并不是一个表达痛苦之义的词语，相反，倒包含着某些催人奋进的意味，就好比呼啸着刮来的西风，将跑在它前面的乌云和垃圾一并驱散一样。我想拥有那种激情。如何才能获得呢？令人激情澎湃的是什么？您所谓的激情是什么意思？

克：我认为应该澄清一件事，即贪欲和激情是不同的。

贪欲通过思想得以持续，它受思想的驱使，在思想中滋长，汇聚能量，直至爆发——或者通过性，或者，如果是权欲，则通过种种极端的手段。

而激情与之完全不同，激情既不是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对逝去往事的铭记；它不受任何实现抱负的动机所驱使，亦不是徒劳的伤悲。

问：所有性欲都属于贪欲吗？性冲动不总是思想的结果，它很可能是一场邂逅，比如你突然遇到了某个人，他（她）的可爱俘虏了你。

克：只要思想构画的是享乐场景，那必定是贪欲，而不是激情迸发。如果享乐是主要的推动力，那就是贪欲。脱胎于享乐的性欲是贪欲，因爱而生的性欲却不是，尽管当时也可能伴有巨大的愉悦感。

这里，我们必须认清并亲自去发现，爱是否已经将享乐和享受排除在外了。当你看到一大片云彩，欣喜地看到它在天空中竟然如此“庞大”，云端上方还闪着光亮，这当然是种享受，但是这里面所包含的又远非如此。

我们绝对不是在谴责这种乐趣。但如果你是为了某种刺激，持续在思想上回想或在实际中回望那抹云彩的话，那你就是沉浸在想象的奇幻之旅中了，很显然，此处正在运行的刺激性因素是享乐和思想。而当你第一次抬眼望那片云彩，看到了它的美，那时的思想并不包含这种享乐的动机。



性的美丽在于忘“我”（“我”也可以叫做“本我”），但是，对性念念不忘则是在肯定“本我”，那便是享乐。这个“本我”要么总是追求享乐，要么一方面躲避伤痛，一方面又渴望成就，因而招致挫败。在这整个过程中，充满激情的感觉在思想的作用下得以持续，人们不断追随这种感觉，不知不觉它就蜕变成了享乐，不再是激情。希望，追求记忆中的激情，也属于享乐。

问：那么，激情本身是什么呢？

克：激情与快乐和狂喜相关，快乐和狂喜都不属于享乐。在享乐中，总是依稀带有一种努力的痕迹——如认知、奋斗、需求以及为保持和拥有这种乐趣所做的挣扎。

在激情中没有需求，因而就没有挣扎。在激情中也没有一丝一毫满足的迹象，因此既没有挫折也没有痛苦。激情就是摆脱“自我”，而“自我”正是所有满足

和痛苦的核心。

激情从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它就是“存在”。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它是静止不动的。激情是自我否认式的朴素，摈弃了“你”、“我”的概念；因此，激情是生命的本质，生命因此而动，繁衍不息。但是，一旦思想中闯入了诸如拥有和占有的念头，激情就会消逝。没有了激情，一切创造都只是空谈。

问：您所指的创造是什么意思呢？

克：是自由。

问：什么自由？

克：从“自我”中走出来而获得的自由。自我依赖于环境，是环境的产物——由社会和思想拼合而成。而摆脱了自我而获得的自由则是澄明清醒，是一种用过去无法点燃的激情之光。因而激情只存在于当下。

问：这激起了我心中一种奇异的新感受。

克：这就是学习的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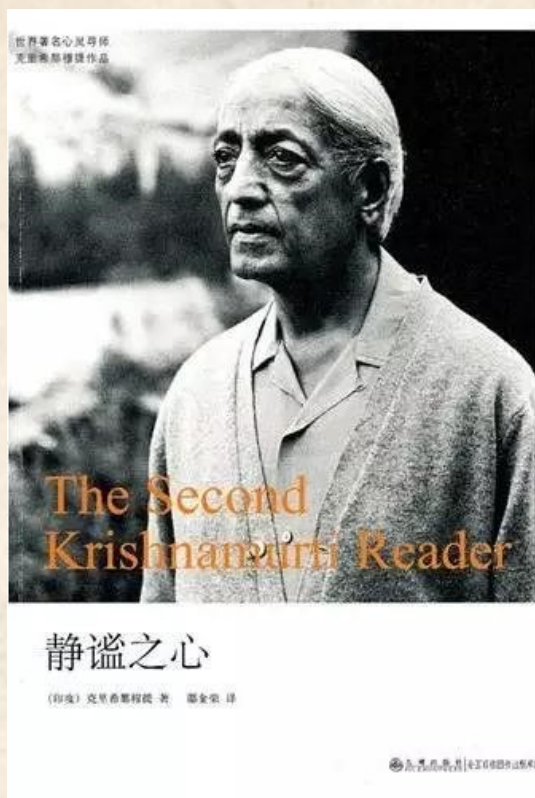
问：日常生活中需要做些什么特殊的事情才会保证这股激情不停地燃烧并激励自我呢？

克：除了专注于“学习”这个当下的行动之外，什么也保证不了。激情之美就在这份专注中，激情就是完全抛弃了“自我”及其相关的时间。

本文选摘自《静谧之心》

克里希那穆提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静谧之心》由克里希那穆提两部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作品《心灵的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和《改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组成，它为我们指明了建立新秩序的必由之路——摒除内心的嫉妒与邪恶，放弃所有已知的事物。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进入纯真的状态，从而“让呈现于眼前的永远都是全新之物”。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文字校审:@沧桑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5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小寒